

吳尚之
生新
閱存

2007/2

出版博物館主刊
总第2期 2007年12月出

出版 博物館

Publishing Museum

要目

- 联想与建议 / 王仿子
- 以文化为命脉 与时代同步趾 / 陈绛
-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段往事——吴朗西先生的一个遗愿 / 姚福申
- 马飞海同志与《艺苑掇英》 / 杨涵
- 韬奋曾用名“季之华”的由来 / 邹嘉骊
- 新发现张元济致严复信稿三件 / 张人凤

馆藏赏阅



赵宏本(1915~2000年),江苏阜宁人。擅长连环画、中国画(人物)。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连环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赵宏本被誉为连坛“四大名旦”之首。他与钱笑呆1963年合作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获得全国首届连环画评比一等奖、1981年又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野间儿童插画比赛”三等奖。

赵宏本早期绘《秋海棠》原稿



九旬前辈捐珍藏

林丽成



开明书店长沙分店店徽 1947年的开明书店店徽 开明书店早期店徽

1914年出生的刘甫琴先生，17岁入开明书店工作，1947年到台湾负责创办开明书店台湾分店，1981年从台湾开明书店退休后定居美国洛杉矶。

2007年6月，经刘冰先生牵线，我们有幸在洛杉矶长青书局对刘甫琴先生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这是他60年来第一次面对来自上海的家乡人。

2007年秋，九三高龄的刘甫琴先生只身回国，这是他离开大陆60年后的第一次回家。刘老先生带回了珍藏多年的三枚开明书店店徽，捐赠给出版博物馆。由于刘甫琴先生曾担任长沙分店的经理，所以保存着该店的1号店徽。

顾问:

丁景唐

编委会主任:

李新立

编委会委员:

郝铭鉴 雷群明

邹振环 张志强

杨 扬 林丽成

主办单位:

出版博物馆

编辑:

出版博物馆编研部

主编:

林丽成

责任编辑:

张 霞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卜允台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5号

电话:

021-54656210

邮编:

200020

E-mail:

pm@sppa.gov.cn

印刷:

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号:

沪准(K)第0575号

出版日期:

2007年12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卷 首

1 / 九旬前辈捐珍藏 / 林丽成

睿思箴言

4 / 联想与建议 / 王仿子

缅怀追思

6 / 缅怀祖父 奉献社会 / 张人凤

11 / 以文化为命脉 与时代同步趾 / 陈 绛

书业史话

18 / 新中国出版事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和演变 / 方厚枢

26 /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段往事

——吴朗西先生的一个遗愿 / 姚福申

捐赠者说

32 / 整理旧书随记 / 刘 冰

书林刊苑

38 马飞海同志与《艺苑掇英》 / 杨涵

41 奇人奇书奇事

——王世襄与《髹饰录》的50年 / 丁宁

50 / 记“《辞海》晚报” / 卢润祥

52 / 孤本《雪庵字要》的传世与流布 / 柳和城

书界故人

59 / 鲁迅笔下的“傻公子”刘承干 / 宋路霞

64 / 解放初期的赵宏本与连环画 / 陶长华

史实证考

68 / 韬奋曾用名“季之华”的由来 / 邹嘉骊

书简辑录

72 / 新发现张元济致严复信稿三件 / 张人凤

77 / 陈翰伯给陈江的信 / 陈 江

80 / 陈寅恪先生书信辑注 / 高克勤

Contents

Foreword

1 / Donation of Treasures from Our Senior in His Nineties / LIN Li-cheng

Farsightedness & Admonition

4 / Associations & Suggestions / WANG Fang-zi

Memory of the Deceased

6 /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Grandfather / ZHANG Ren-feng

11 / With Culture as Lifeline & Abreast of the Times / CHEN Jiang

Publishing Legends

18 /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 FANG Hou-shu

26 / A History of the Life &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An Unfulfilled wish of Mr WU Lang-xi / YAO Fu-shen

Words from Our Donators

32 / Casual Notes when Reorganizing Old Books / LIU Bing

Galaxy of Books & Journals

38 / Mr MA Fei-hai & *Yiyuan Duoying* / YANG Han

41 / Unusual Man, Unusual Book & Unusual Events:

the Fifty Years of Mr WANG Shi-xiang with his *Lacquer Coating Patterns* / DING Ning

50 / On "*Ci-Hai Evening*" / LU Run-xiang

52 / The Only Extant Copy of *Xue'an Zi Yao*: Its Down-Handing & Dissemination
/ LIU He-cheng

In the Publishing Circle

59 / "The Fool" LIU Cheng-gan, Nicknamed by LU Xun / SONG Lu-xia

64 / Mr ZHAO Hong-ben and Picture-Story Book in Early Days of PRC / TAO Chang-hua

Historical Researches

68 / The Origin of "JI Zhi-hua", a Name Used by Mr ZOU Tao-fen / ZOU Jia-li

Filing the Letters

72 / The Three Newly-Discovered Letters by ZHANG Yuan-ji to YAN Fu / ZHANG Ren-feng

77 / Letters by CHEN Han-bo to CHEN Jiang / CHEN Jiang

80 / A Variorum of Mr CHEN Yin-que's Letters / GAO Ke-qin

联想与建议

编者按：此文系王仿子先生于生活书店 75 周年纪念活动（上海）前写给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汪家明同志的信。王仿子先生在信中对出版史料的整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出版博物馆将从拍摄三联老同志的“口述历史”着手，把三联书店的史料整理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希望有关机构和“三联的老人”能提供帮助，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

今年是生活书店 75 周年。可惜我不宜远行，不能到上海参加盛会。近日见到商务印书馆的大事记，在欣赏他们编得好之外，引起一点联想。

联想之一：现在对民国时期的出版工作，知道大后方、解放区、沦陷区（上海孤岛）三大块情况的出版人已经不多了。现在正在印刷中的《中国出版通史》的《民国卷》的质量很令我担心。我在去年听说：这一卷的著作人知道抗战前上海出版业情形（大概拿到了相关史料），不太了解抗战开始后的情况（大概没有这方面的史料），以为日本人一打进来，中国的出版就一败涂地，不知道战争激发了出版的大发展。虽然有国民政府对进步文化出版的迫害，也不能低估因抗战出版的兴旺。又有解放区的出版工作在各战区遍地开花（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多次派人到敌后去开店、做出版）。这一卷的初稿，在讲民国时期著名出版人这一章的题目上，只有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三个人的名字，说明他们不知道邹韬奋在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地位。听说后来已有修正。

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对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宣传得太少了，它的光荣历史许多人不知道。

联想之二：从生活书店成立至今的75年，也是三联的75年，能不能编印一本类似商务110年大事记那样的书呢？如果编成，人们会看到，三家书店对文化的贡献是赶不上商务的，商务这方面的底子丰厚。但用出版为革命服务这方面是这三家书店光辉的一面，是商务、中华、开明（中间偏左）所缺乏的。

这三家的许多书被查禁，数十家分支机构被封闭，工作人员被捕入狱；这三家又几次派人到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在战火纷飞的地区开店，都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动员群众抗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舆论准备。把这些事例的年年、月月、日日记录下来，既触目惊心，又光芒万丈，三联书店的光荣历史就在这17年（1932—1948）。

曾经有一次，某报报道某地的三联，讲三联的历史，只从1948年讲起，不提前17年。我认为：丢掉这17年，就是丢掉三联的光荣史。

如果能编这么一本简要的从生活书店开始到今天75年的历史（参考商务的编法），显然，在让后人知道三联的历史这一点上，它的效果比已经出版的生活、读书、新知这几本史稿会更明显。

如果接受这个建议，要赶快动手编这样一本大事记，三联的老人不多了，每年都要走几个，有些事还留在老人的记忆中。

21号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

缅怀祖父 奉献社会

张人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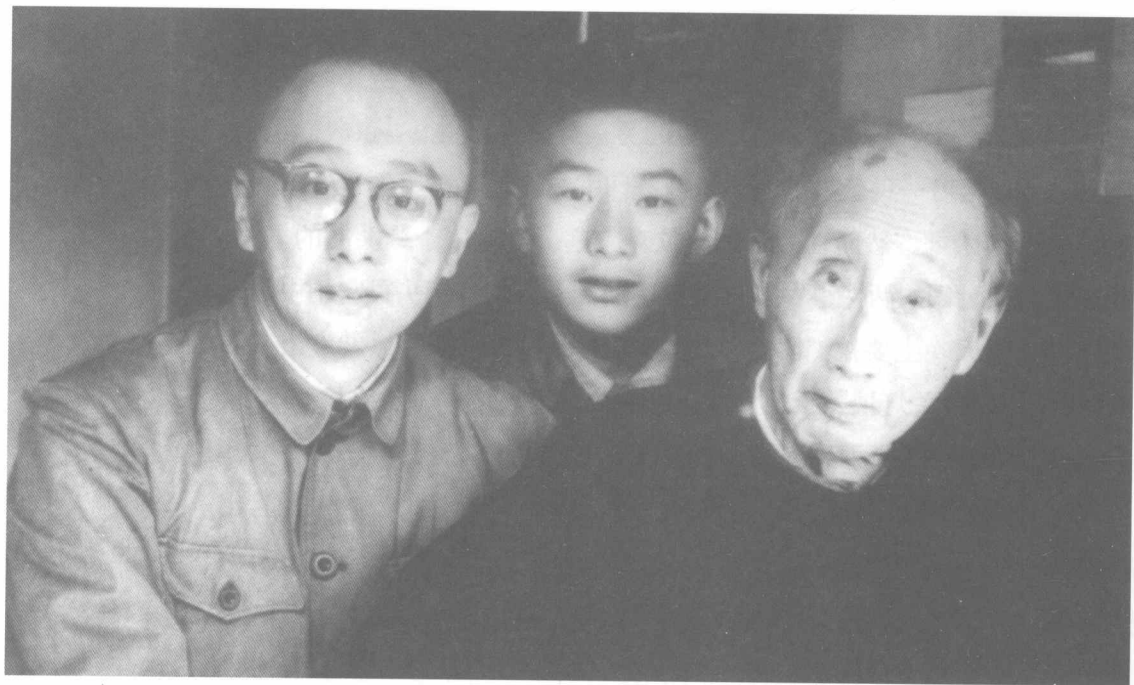
我从出生起，就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在我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勤奋。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他已近八十高龄，却每天在自己的卧室兼工作室里忙个不停，别人不能去打扰他。当我早上走进他的卧室请早安的时候，他早已吃过早饭在书桌前忙。早上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一位通信员师傅骑了自行车来，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其中有急件，便立即书写回复意见，让通信员带走。其余文件，接着再处理，一忙便是大半天。下午四点多钟，通信员再来一次，把祖父写的字迹密密麻麻的许多信件及文件取走。稍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靠在沙发里看书，有时边看边记录。在1949年底患中风之前，几乎天天如此。患中风以后，经过一年休养，除了左半身不遂，无法起床自由活动外，体力和思维都得到了恢复。于是他每天坐在床上，床上放一张矮桌，继续看他的书，时不时要给商务印书馆写一些信。这时，通信员师傅又来了，只不过从每天两次改为早上一次。那时候还有一件给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看他挥毫写对联、屏条等。因为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受到日本侵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毁灭性打击，家庭经济状况也直线下降。在一位亲戚的启发下，祖父开始鬻书卖字，以维持生计。一时来求墨宝的人倒也不少，所以他隔几天，就要在我们全家用餐的餐桌上铺开一卷厚厚的报纸，上面覆上事先折叠好五格或七格的连史纸，握管书写。一次一般写上二三副对联，写好移到地板上晾干。

有时替客户写扇面，用工整的小楷写，老人目力不够，就叫家人把桌子抬到窗边，光线好一些，他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天，十分费劲。

祖父是一个极严肃的人，这是我的另一个印象。他很少跟我们说笑，家里人对他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商务印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的老同人也有这样的感觉。然而，他又是一位对家庭、对晚辈十分关心的老人。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两件事：抗日战争后期，上海的日伪头目害怕中国军队空袭，每天晚上要搞“防空”，里弄里的伪保甲长天一黑就发出一阵阵吼叫“关灯，关灯！”于是大家只好呆在一片黑暗中，直到很晚才“解除警报”。大人们还可以忍耐，小孩子就觉得又饿又害怕。一次祖父小心地扶着栏杆，从漆黑的楼梯摸索着上到我和父母居住的三楼，商量出一个办法，让我在壁橱（实际上是一个小储藏室）里开了灯、关上门，先吃晚饭。祖父看我安心地吃上了晚饭，才慢慢地回到自己房内。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字，祖父拿出两样东西，交给我母亲：一件是他亲笔书写的一幅《历代世纪歌》，那是明末清初万青藜的诗歌作品，七字句，从三皇五帝讲到明末，祖父续了后面讲清朝的六句，让母亲教我朗读和背诵；另一件是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一幅彩色教学挂图，用不同颜色的长方形色块表示不同的朝代，按时间先后从上到下排列出来，色块的长度和朝代的年代长短成正比例，两者互相配合，使我幼时的脑海中就有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粗略框架。

除了小时候的印象和记忆，我对祖父的一生，他的经历，他的事业，说实在的，几乎没什么了解，即便有，也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段。

改革开放不久，商务印书馆老领导陈原先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山东大学古籍专家王绍曾先生和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等着手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我从那时起在父亲指导下开始做资料的收集、抄录工作，这才慢慢地对祖父的一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原来他是一位清代的翰林，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和外文，以这一实际行动投入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来到上海，到刚开办不久的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主持翻译出版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籍等，其中以严复



1954年11月28日祖孙三代合影

译《原富》（后译《国富论》）最有影响。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在京城办通艺学堂培养少数英才，转变为提高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四年后，他应成立不久的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邀请，离开南洋公学，于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组建编译所，实现他普及教育的抱负。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个世纪，终其一生。在他主持商务编译事务的十多年间，他和高梦旦、蒋维乔等人一起，编写了我国近代第一套成功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及时地提供了最为必须的“教学软件”。他亲自参与编纂的《辞源》，是我国第一部按词的条目排列的大型汉语辞典工具书。商务出版的中、外文辞典，可以用“蔚为壮观”四个字来形容，这一特色保持到了今天。1903年，他为出版严复译的《社会通论》一书，主持了商务和严复两方面签订出版合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这是中国第一份正式的出版合同，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他与夏瑞芳共同提议出版的时事、政治、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经他约稿，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等名家翻译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名著，开一代风气之先。由他倡导、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在上海宝山路上建立的东方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由一家民营企业创办的大型公共图书馆。馆内收藏我国省、府、厅、县的地方志数量，远远超出国内其他图书馆。他主持校勘、影印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是我国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1930年前后的商务印书馆，无论规模、还是出版物的数量和水平，都可以和同期欧美大出版社媲美。也就是说，中国的出版业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同行一二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一个奇迹。为出版界和史学界所公认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现，它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祖父年事已高，很少出门，除了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有一些往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因为在遭受日寇屡屡打击之后，商务印书馆当时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总经理和总管理处辗转于长沙、香港、重庆，而以祖父为首的董事会坚守上海。他们不向日伪当局工商登记，为避免亲日势力的渗透而八年不召开股东年会，在上海靠印刷一些古书或科技书维持生计。抗战胜利以后，局面有所改变，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祖父在那些日子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半隐居的状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初陈毅市长就和统战部长周而复到我们家来访问。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开怀畅谈。就在上海刚解放的几个月中，祖父改变了以前十多年的生活状态，积极参加第一、二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座谈会，就工业生产、恢复交通、社会救济、教育等问题，同与会者一起积极建言献策。这一年的9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去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同游天坛，又在中南海寓所设便宴招待，陈毅市长全程陪同。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聆听毛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庄严宣言。这一天，祖父心情十分激动，他回忆从1894年踏

上社会起，就遇到甲午战争、割让台湾，以后便是外侮不断，内战，饥荒，民不聊生，民众教育程度低下，等等。此时，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由衷地觉得中国从此有希望了。此后，他虽然患病，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例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他立即上书毛主席，提出了开办西藏语文专校，由藏胞选送子弟入学，编印藏文常识书籍分送藏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等四条建议。一个星期后，毛主席亲笔写了回信，说：“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部门办理。”祖父晚年病中，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后改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由毛主席提名，祖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1954年和1958年两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生活上和医疗条件上，祖父也受到很好的照顾。他病重住院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程前往华东医院探望。

改革开放之后，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为张元济研究做了很多资料工作，写了一本回忆录《我的父亲张元济》，主要从家庭生活、父子亲情的角度来写，是其他张元济传记作者无法做到的，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我本人是一名数学教师，过去只在学校讲微积分课。改革开放之后，在父亲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抄录祖父的资料，进而设法寻找相关资料。渐渐地，我对祖父的生平和事业的认识有了深化，也能把资料整理中的一些心得写成短文，开始在上海出版界老领导宋原放先生主编的《出版史料》杂志上刊登。慢慢地，写的文章也可以长一点了，也可以论述一个较为完整的问题了。

2005年底，我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使我在退休之后，有一个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学术活动，向众多前辈老专家学习的机会。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今年，我把过去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张元济研究文集》，目前正在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做《张元济全集》的编辑工作。

（本文作者为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缅怀追思

以文化为命脉 与时代同步跬

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 140 周年

陈 绛

我知道张菊老的名字，是在六十多年前读中学的时候，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知道菊老的大名。那时学校从东南海隅迁到内地，图书馆的书不多，却有一部《万有文库》，排放在一个房间里好几个书橱上，完全开架，可以随便取阅，让我接触到不少中外名著，印象最深的是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而家中一套《说部丛书》，则是我寒暑假回家最好的消遣读物。在读小学和入学以前，看到父亲书桌上一部《辞源》，厚厚两册，黑色的封面和烫金的书名，觉得高深莫测。当时母亲为我订阅了商务印书馆半个月出一期的《儿童画报》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周刊，每当刊物寄到的日子，我总是企翘盼望。还有《儿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它们是我童年的“心灵鸡汤”。菊老主持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工作，开启民智、嘉惠后学。我在童蒙和少年求知的道路上，便受到了沾溉。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心存感激。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读大学，学校在梵皇渡。我的叔父陈夙之（懋解）那时住在兆丰别墅，婶母是李拔可（宣龚）先生的胞妹，叔父和拔可先生都同菊老有深交。解放战争后期，叔父以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接替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出任鼎革之际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我从学校穿过中山公园便到叔父家，那时叔父常常到上方花园菊老家，大概总是商量商务的事。我的姑母陈懋恒有一段时间，也常去上方花园看望菊老。她还是菊老孙女张琬女士在中西女中读书时的历史

慶祝張菊老九十生日攝影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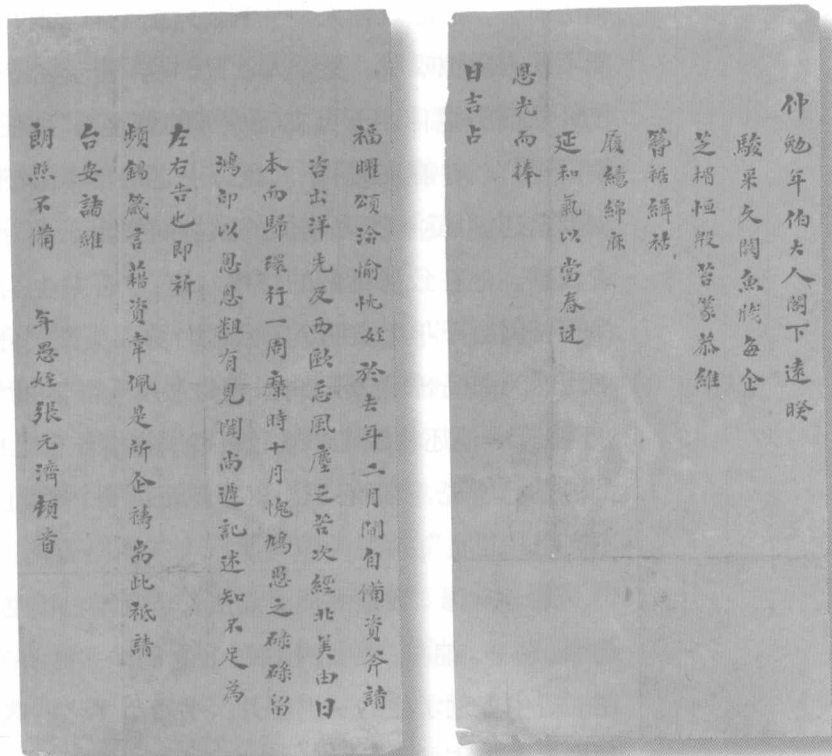


张元济先生九十岁生日与商务同仁合影，前排左三为陈凤之

老师。^①我常常听到他们谈起菊老。我从这时起，对菊老开始有了比较亲切而具体的印象。我的伯父陈徵宇（懋鼎）早年做京官时，菊老曾同他和夏偕复、王仪通四人联名向总理衙门呈请开办通艺学堂。^②菊老罢官南下时，他有诗送别。^③伯父去世后，菊老写了挽联，^④还同商务联系出版他用文言文翻译的书稿大仲马的《岛雄记》（今通译《基督山恩仇记》）。^⑤几年前我翻检旧物，见到一封菊老到日本后给我二伯祖父仲勉（宝璫）公的信。前不久，一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朋友复印一份日本人小方宗太郎的日记寄给我，上面记载1922年4月22日小方和菊老、郑孝胥一同上日本大阪公司轮船福建丸，为我的大伯祖父弢庵（宝琛）公去北京送行。我查了郑孝胥这一天日记，有这个记载；郑孝胥日记还记载，在此前两天，陈宝琛到上海，当天晚上菊老便同李拔可、高梦旦和郑孝胥一起去看他。^⑥菊老《书札》中有一封给他的信，说到将他先世《横浦文集》和当时新出版的几种《百衲本二十四史》送给他。^⑦商务还将陈氏澄秋馆所藏书画选入民国年间出版的《名人书画集》系列。看来我的父祖辈中有四五位都同菊老有过交往。今天，我又很荣

幸和张人凤先生同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这样算来，我家同菊老一家有三代的世谊。

菊老的人格魅力凸现在他对祖国文化的珍爱上。他为辑印包括《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鞠躬尽瘁，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说自己“既已担任，不能不拼命为之”。他告诉傅增湘，有一段时间，为了校印《衲史》，“几至废寝忘食”。^⑧他在1919年商务刊印《四部丛刊》启中写道：“自



张元济给陈宝璠的信

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⑨ 1934年在辑印《丛刊续编》缘起时，他又写道：“世方多故，古籍销亡，国学起衰”，辑印古籍，尤其迫切需要（“相需尤亟”）。^⑩正是眼见古籍散失，国学衰微，出于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紧迫感，菊老全身心地投入古籍的搜集刊印工作。菊老以涵芬楼藏书为底本，以自己的声望和人缘，广泛联系海内外藏书家，将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在内的善本珍籍收入《四部丛刊》。菊老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了和辑印《四部丛刊》一样，不遗余力搜求善本珍籍外，还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正讹补夺，并且写了《校勘记》。曾在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的王绍曾先生这样评价菊老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只看到他辑印《衲史》所取得的成就，忽略了他

在校勘上所作的出色贡献，那将是买椟还珠，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张先生校史为我国史学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将永垂史册。”^⑪刊印这样大型丛刊，这需要有怎样的眼力、魄力和毅力，不能不使人震惊叹服。更令人钦佩的是，菊老主持这两部古籍印行的时候，已经从商务退休，不再支领商务的薪金，“纯任义务不下十年”，“自编校以至广告，在在费神”。商务决定每年奉致酬金，菊老一再坚拒，将支票退还。^⑫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样出于他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他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⑬他说：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⑭他还将编纂小学教科书同样看作自己应尽的“国民义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⑮

菊老自称“我是书丛老蠹虫”，一身本色读书人。^⑯爱书、读书、访书、购书、藏书、编书、校书、出书，菊老徜徉书林，在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在书香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岁月。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赖书籍以传承和推广。菊老将古籍的收藏刊印，看作国脉所系，展现了菊老对祖国文化赤忱之情。

菊老科举出身，翰苑中人。然而四书五经的熏陶，并没有使他成为抱残守缺的陋儒，锲订章句的腐儒，相反地，他继承了儒学经世的传统，通权达变，紧跟时代的步伐。他诞生的时代，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也是中学和西学彼此冲突而又互相汇通的时代。他说自己生活在这样巨变的时代，“见皆所未见，闻亦所未闻。不幸乃大幸，真堪傲古人”。^⑰他自称“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商务所以能取得成绩，“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⑱“新”，当然不仅指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化，但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新”，主要就是西方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不同层面的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西异质文化，这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面临的无可回避而又往往感到惶惑的重大课题。菊老对于两者的态度，显现出兼收并蓄的宽宏